

# 隐喻、问题表征与毛泽东的对外政策

张清敏

**内容摘要** 问题表征指特定情景或问题被理解和表达的方式。隐喻既是认知工具,也是问题表征的手段,不仅影响认知过程,也影响政策结果。通过对《毛泽东外交文选》文本的分析,可以了解毛泽东在认知过程使用隐喻的特点。毛泽东的认知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认知一致性”和“认知框框”的特点。他使用的隐喻在政策制定的初期影响其对问题的表征和对形势框定;在确立政策阶段具有指导行动或问题解决功能;在政策制定后期具有说明政策的公共性功能。隐喻运用方式的消极影响表明,在对认知过程进行研究的时应将社会和文化因素纳入其中。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对外政策分析 毛泽东 政治心理学 认知研究 隐喻

对外政策决策被认为是“从多种受社会限定的不确定选项中,决策者挑选其中一种他认为能够实现所构想的特定状况的过程”,<sup>①</sup>虽然客观的决策环境是限制决策结果的最重要要素,但决策者对形势的认知、分析和把握,以及对问题的界定和框定是做出对外政策决策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因为决策者如何界定他所面临的局势,框定、命名新发生的事情,对于决策方案的产生和方案的选择都将

\* 张清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100871)

\*\*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硕士研究生潘丽君同学曾在作者的指导下对这个问题作过前期研究,作者在此表示感谢。

① Richard Snyder, H. W. Bruck and Burton Sap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New York: Free Press, 1962, p. 57.

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对外政策分析学界,决策过程的这一阶段被称为对问题表征(Problem Representation),是专门研究决策者如何认识形势的。<sup>①</sup>

本文借助认知研究中最常用的工具之一“隐喻”(metaphor),以《毛泽东外交文选》(以下称为《文选》)为分析文本,探讨以下问题:(1)毛泽东是如何借用隐喻框定或表达他所面临的形势和对手的;(2)《文选》所使用的隐喻反映了毛泽东怎样的认知特点;(3)这些特点如何影响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对外政策;(4)关于隐喻在毛泽东认知形势、框定问题过程中作用的研究,可以为政治心理学领域的相关研究贡献哪些中国因素等。为此,本文首先介绍对外政策决策研究中问题表征的相关理论,特别是隐喻在问题表征中的作用;其次,以《文选》为例探讨毛泽东运用隐喻的特点,并分析隐喻对毛泽东认知形势、确立对外政策的影响;最后,文章尝试对认知心理学中关于隐喻作用研究的相关结论提出一些基于中国外交实践的看法。

## 一、隐喻、认知与问题表征

“问题表征”是指在特定的决策背景或局势下理解问题的方式。对问题表征的研究关注的是领导人如何理解和界定他们所面临的局势。<sup>②</sup>当问题发生的时候,人们往往先给这个问题下一个定义,起一个名字,并通过这个定义或名字确定这个问题的性质。问题表征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作为解释问题的框架,问题表征引导信息的获取和诠释,而在随后的信息处理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与所采用的表征一致的方案的产生;它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些方案被认作是可行的,从而被考虑,而另一些方案甚至都没有在决策过程中表现出来。<sup>③</sup>例如,1990年,伊拉克入侵和占领了科威特,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对这个问题的表征是伊拉克“解放”了科威特。如果按照萨达姆的这种表征,伊拉克领导人和实施对科威特“解放”的伊拉克军队应该得到嘉奖。但是美国领导人对这个事件的认知和表征完全相反。国务卿贝克把萨达姆占领科威特说成萨达姆“坐在我们的经济命脉上”。老布什总统认为萨达姆占领科威特“勒住了美国经济的咽喉”。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的美军总司令施瓦兹科普夫将军把伊拉克占领科威特称为伊拉克“强奸”了科威特。<sup>④</sup>美国领导人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这一历史事件的表征,反映了美

<sup>①</sup> Donald A. Sylvan and James F. Voss, eds., *Problem Representa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

<sup>②</sup> Donald A. Sylvan and James F. Voss, eds., *Problem Representa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p. 4.

<sup>③</sup> 杨溢〔美〕乔纳森·凯勒《外交决策中方案的产生与选择:一种综合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第73—87页。

<sup>④</sup> Keith L. Shimko, “Metaphors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5, No. 4, Dec. 1994, pp. 655-671.

国政府对这个问题性质的认识,影响了美国人民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态度。因为对一般美国人来说,他们甚至不知道伊拉克和科威特在哪里,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说成是影响美国经济命脉和普通美国人民生活的重要事情其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即使不说这件事对美国的影响,所有有良知的人都知道,“强奸”是一个不可宽恕的罪行,无论是谁,只要犯了这种重罪,就必须得到惩罚。美国领导人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这种表征和框定得到了普通美国人的理解和支持,他们高度支持政府派出大量军队,投入大量财力,将伊拉克从科威特驱逐出去。对一个事件的不同表征反映不同的政治立场,并有政策含义,即对此后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在国际交往中,根据交往对象的不同用词或对这个事件的不同表征,可以判断这个人的政治立场。由于问题表征的重要政治含义和政策影响,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表征或叙述有时候还可能引发外交纠纷。例如,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编撰的教科书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爆发的“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抗议。如果说对历史事件的表述非常重要的话,那么,新发生事件表征的政治含义就更加明显,它往往预示着随后可能执行的政策。

对问题的表征受到决策者,即认知主体、认知对象或客体,以及对认识方式和过程研究的操作性困难的影响。从认知主体来看,对问题的表征是一个认知主体与客体互动的过程,是决策者对客观现实世界进行认知的过程(cognitive process)——头脑和环境互动并从外界获得及解释信息的过程的重要部分。<sup>①</sup>对认知过程的早期研究认为,<sup>②</sup>人们总是保持认知的一致性(cognitive consistency),即保持自己的价值观、周围环境和自己行为的一致。一旦一个人的行为与其态度或信仰出现不一致,他的主观感受肯定是很难受的,这种不一致被称为“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sup>③</sup>20世纪70年代,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经历了认知的革命,随后兴起的社会认知理论揭示了认知过程中的多种状况和特点。它不仅发展了认知一致性的理论,而且提出理解和研究认知过程的多种模式和途径。如为了保持认知的一致性,人们在认知过程中或有选择地定向信息,或有选择地关注信息,或有选择地解释信息,尽量保持信仰、环境和行为的一致。<sup>④</sup>在认知一致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常用的认识模式是认知图式(schema)理论。认知图式被认为是“记忆中储存的关于特定物体、形势和人的一个总体概念”;或者“一个人对于社会和政治如何运作的主观‘理论’”,是由人的经历、知识、兴趣、教育等构成的,简

① Matha Cottam et al., eds.,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sychology*, Mahwah, NJ and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 2004, p. 9.

② 张清敏《国际政治心理学流派评析》,《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3期,第71—101页。

③ David Patrick Houghton, *Political Psychology: Situation, Individual, and Cases*,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116-117.

④ Susan Fiske and Shelley Taylor, *Social Cognition*, New York: MacGraw-Hill, 1991, p. 469.

化了的知识结构或认知框架,具体指导人们吸收、储存、处理信息。<sup>①</sup> 认知图式指导人们处理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大量信息,帮助认清形势。

另一种被称为“归因理论”(attribute theory)的模式认为,认知主体在处理信息、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往往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无辜的“天真科学家”,从别人的行为中找自己行为的原因,把自己的错误归因于别人,或认为是环境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而把别人的不足归因于其人品不良或人性的险恶。还有研究表明,人们在处理信息的认知过程中往往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形成一定的认知陈规或定式,认为一旦一个人或事属于一个种类,就认为他/它们就具有这一类或一群人所具有同样的特点,而放弃对特殊个性的关注。比如,美国领导人将伊拉克—伊朗—朝鲜都说成是同一类的邪恶轴心;<sup>②</sup>“9·11”事件后,西方流行一个普遍的认识,把那些他们认为不负责任的国家看作是“流氓国家”等。<sup>③</sup>

从认知客体来看,对外政策的决策者每天都面临着新形势、不熟悉的环境、具有挑战的问题等环境压力,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任务所产生的来自国内外不同领域的政治压力,需要短期做出反应和对策的时间压力,以及每天都需要接收、辨别和处理大量的、不确定的信息压力。人的记忆能力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对所有新情况无师自通,或像高速计算机一样快速处理大量的信息。因此,决策者需要从众多信息中筛选有用的信息,大脑中的认知系统帮助他们把环境组织成可以理解和可以认识的单位,经过信息的过滤形成有意义的概念。

理论上说明认知过程非常简单,但要对这个过程进行可操作性理解、把握和研究则非常困难。虽然研究者可以运用现代神经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追踪思想的脑波,却不能透露里面的任何内容。唯一可以借助观察思维和认知过程的主要工具是语言。因为语言不仅传递思想,而且还在其结构中带有思维如何工作的痕迹,语言因此也被称作“心灵的窗口”。它不仅能通过其象征力,创造意义,具有建构功能,而且从认识论角度看,语言也是人们认识世界所必不可缺的,因为“我们必须通过语言才能把复杂的社会世界表述出来,使之条理化、有序化”。<sup>④</sup> 在对新形势和新问题的认识和表征过程中,决策者往往把抽象和含糊的新情况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类似的具体和明确情景进行比较,把不熟悉的问题

① Deborah Welch Larson, *Origin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51;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5-26.

② 孙吉胜《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170页。

③ K. P. O'Reilly, "Perceiving Rogue States: The Use of the 'the Rouge State' Concept by U. S. Foreign Policy Elites,"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3, No. 3, 2007, pp. 295-315; Mary Caprioli and Peter F. Trumbore, "Rhetoric Versus Reality: Rouge States in Inter-State Conflict,"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9, No. 4, 2005, pp. 770-791.

④ 孙吉胜《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第3—4页。

题与人们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和了解的其他领域的事情进行比较,以帮助人们理解环境、认识问题。前者被称为历史类比(historical analogy),后者则被称为隐喻或比喻。

隐喻和类比在人们认知过程中的作用有类似之处,对政策制定过程产生影响的原理也相同。相对而言,学界对于运用历史类比指导对外政策决策的实践已经有相当丰富的研究。<sup>①</sup> 类比是启发思维(heuristics),走捷径的一种手段。这种思维的形式化表述为,如果事件 A 与事件 B 二者都具有 X 的属性,同时 A 又具备 Y 的属性,就可以推断 B 也具有 Y 的属性。通过对某些方面相同或类似的情况进行比较,从而根据历史经验做出决定,以推断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具有相似性。<sup>②</sup> 杰维斯(Robert Jervis)将这种思维模式概括为两阶段的假设模式“历史事件——历史经验教训——未来行为”。<sup>③</sup> 例如,1914 年欧洲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的僵硬外交和过激行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人为灾难。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痛教训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人们普遍不希望 1914 年夏天的事情重演,英、法、美等国对德国采取了缓和的政策,这个政策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后来发展成为极端的绥靖政策,但纵容德国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绥靖主义的代名词“慕尼黑阴谋”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反的经验,影响了战后以来许多国家的外交决策,如美国参与的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等所有重大外交政策的决策。<sup>④</sup>

所谓隐喻,就是把看不见或不容易理解的现象和事物与一般人都较为熟悉的现象或事物进行比较,以帮助人们理解这些事情。亚里斯多德称“隐喻就是给一物本属于他物之名”。<sup>⑤</sup> 拉科夫(George Lakoff)和约翰逊(Mark Johnson)在对隐喻进行研究后指出,隐喻并非仅仅是修辞的一种手段,“隐喻的本质是以一种事情去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情”。<sup>⑥</sup> 沃斯尼亚杜(Stella Vosniadou)和奥托尼(Andrew Orto-

① Earnest R. May, *“Lessons” of the Past: 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Press, 1973; Richard Nwstadt and Earnest May, *Thinking in Time: The Uses of History for Decision-make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n,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 of 196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Dwain Mefford, “Analogical Reasoning and the 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 Back to Snyder for Concepts and forward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Method,” in Hermann et al.,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Boston MA: Unwin Hyman, 1987, pp. 221-247. Arthur Schlesinger, “Review of ‘Lessons of the Past’ by Earnest Ma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61, No. 2, Sept. 1974.

② David H. Fisher, *Historians’ Fallaci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0, pp. 243-259.

③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World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26.

④ Earnest R. May, *“Lessons” of the Past*;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⑤ Keith L. Shimko, “Metaphors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p. 657.

⑥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 5.

ny)对历史类比和隐喻进行区分后指出,“前者(隐喻)可被称作跨领域或隐喻性比较,而后者(类比)应该被称为领域内或是直接的、字面的比较。”<sup>①</sup>如说国家X像Y国是一个类比;而把X国说成是多米诺骨牌就是一个隐喻。隐喻和类比的思维逻辑都是通过源域来理解靶域。所谓源域,就是人们经历或熟悉的事或物;靶域则是通过比喻想说明不清楚、不明确的对象。也就是说,人们一般通过具体的来理解抽象的,通过熟悉的来理解不熟悉的。

国际关系或国家政策是宏观的、抽象的,虽然属于客观存在,但人们一般是看不清的。因此,研究国际关系或国家对外政策的学者经常借用隐喻来表达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使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研究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隐喻。例如,将国家看作是“子弹球”,把国际社会看作是“无政府状态”,把国际关系中弱肉强食的规律称为“丛林法则”,将国家之间的争斗说成是“博弈”,将国家之间在军事领域的竞争说成是“竞赛”,将一些国家的对外政策说成是“搭便车”,将美苏之间的紧张而没有爆发直接的“热战”的状况说成是“冷战”等。一些领导人也经常借用隐喻来说明自己的政策,如美国在冷战期间用“contain”(装或盛)来说明对苏联的围堵或限制政策,汉语翻译成“遏制”;美国把风起云涌的第三世界国家革命说成是“多米诺”骨牌一样导向共产主义,美国总统肯尼迪将对古巴的封锁说成是“免疫隔离”(quarantine)等。当然,运用隐喻表征形势和外交问题也绝非美国领导人的独爱,中国领导人也非常喜欢用隐喻形容自己的对外政策,如毛泽东把一切反动派和原子弹说成是“纸老虎”,把一切追随美国的反动势力比作是美国的“走狗”,把美国在其他国家的军事基地说成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等。因此,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研究中运用隐喻具有跨文化、跨国家的普遍性。

直至冷战前夕的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指出,“尚无隐喻在对外政策决策的过程中的作用的研究”。<sup>②</sup>但是,近年来,这种情况有了变化,冷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一些对隐喻在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中作用的探索性研究。<sup>③</sup>在结构和思路,这些研究受到对历史类比研究的影响。通过对隐喻在对外政策研究中的作用与类比的作用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他们的共同点和区别。第一个共同点是它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学界对历史类比相对系统的研究中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历

① Stella Vosniadou and Andrew Ortony, *Similarities and Analogical Reason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7.

② Deborah Welch Larson, *Origin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55.

③ Keith L. Shimko, “Metaphors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5, No. 4, pp. 655-671; Keith L. Shimko, “Foreign Policy Metaphor: Falling ‘Dominoes’ and Drug ‘Wars’”, in Neack et al., ed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ts Second Generation* NJ: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1995, pp. 71-84; Richard Lau and Mark Schlesinger, “Policy Frame, Metaphorical Reasoning and Support for Public Polic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6, No. 1 Feb. 2005, pp. 77-114.

史学家施莱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历史类比只是为决策者宣传已定政策,说服公众、证明决策者根据其他原因做出的政策合理性的一种公关策略,而非影响决策的一个因素。<sup>①</sup> 另外一些学者,包括历史学家梅(Earnest May)、政治心理学家杰维斯等则强调类比对政策形成所产生的影响。邝云峰(Yuen Foong Khong)把类比的这种作用概括称为“类比解释”(Analytical Explanation)框架。<sup>②</sup> 他认为,通过这一框架历史的类比具有以下作用:(1)有助于决策者判断和认识所面临的环境;(2)有助于决策者评估风险;(3)向决策者提供“政策处方”;(4)预测政策成功的机会与可能;(5)对决策结果的道德正当性进行评估;(6)预防与警告政策选择所带来的风险。<sup>③</sup> 他还以此框架分析了在扩大越南战争的决策过程中,慕尼黑、朝鲜战争、奠边府等历史事件对美国决策者所产生影响。笔者通过对毛泽东使用的类比及其作用的研究表明,将历史类比的这两种作用对立起来的看法体现了历史学家和政治心理学家之间的隔阂,只强调其中一面都有片面性。隐喻和历史类比的作用具有共同点,它们的首要作用都在于其对政策宣示意义,即向公众和对手表明决策者采取政策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其次才是其对政策决策结果的影响。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将这后一种作用作为其学术研究的重心,忽视了前一种作用。

隐喻与类比作用的第二个共同点是两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误导作用。类比和隐喻都是在信息不清、形势不明的环境下帮助决策者判断形势、框定问题,指导政策的作用。但是,不管是同领域还是不同领域的比较,都难以找到完全一样的形势或问题,类比和隐喻也都具有误导决策者错误判断形势,导致制定错误政策的消极作用。历史类比的误导主要源于历史是不会重复的,历史上很少有两件事情完全一致,领导人往往从自己有限的历史知识中选择先例,导致历史类比的一次次地被“误用”,一次次误导决策者选择错误的政策。正如黑格尔所言,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就是我们从从来都不从历史中学习。<sup>④</sup> 哈佛大学教授梅甚至将“忘记历史就将遭到历史的惩罚”反过来,说成“只有那些对历史念念不忘的人才会注定受到历史的惩罚”。<sup>⑤</sup> 隐喻同样的误导作用被称作是“危险的陷阱”。<sup>⑥</sup> 但是,与类比误导作用稍有不同的是,作为跨领域比较,隐喻的风险在于比较对象之间的不同性质。如多米诺的隐喻虽然揭示了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密联系和互相依存性与多米诺骨牌有相似性,但是每一块多米诺骨牌在本质上是一样,而国家之间却有明显不

① Arthur Schlesinger, “Review of ‘Lessons of the Past’ by Earnest Ma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61, No. 2, Sept. 1974, pp. 443-443.

②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pp. 1-46.

③ Ibid., p. 22.

④ Earnest R. May, “Lessons” of the Past, p. 179.

⑤ Ibid.

⑥ Keith L. Shimko, “Metaphors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p. 666.

同。多米诺骨牌只有在外力作用下才倒下,而国家革命则不完全由外因导致。这种比较忽视了国家革命的内因和社会因素,把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都当作是由于苏联或中国的指使才发生的,对一些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进行了这样的框定和表征后,也就暗含了从外部阻止多米诺骨牌倒下的政策可能。<sup>①</sup>这正是美国在东南亚国家进行反革命输出的逻辑。

虽然对隐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对历史类比研究的影响,但少数相关研究还是比较和关注了两者的不同。如希姆科(Keith L. Shimko)指出,隐喻和类比都包含了用彼物来理解此物的方法,但隐喻不完全等同于类比。它们在认知功能上,或者说在问题表征及对决策结果的影响不同。因为隐喻是从另一个全新的领域借鉴而来,它的作用相对分散和笼统,其作用主要在于帮助决策者对问题的框定,即界定形势、分析问题、评估风险,也可能提出比较笼统的政策建议,但它所回答的主要问题是“我面临的形势是什么?”<sup>②</sup>相对于比较而言,类比体现的更紧凑,类比中包含的相似性更强烈和明显,它能帮助决策者确定具体的行为轨迹,评估政策成功与否的前景,其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该采取什么行为?”因此,具有更重要的帮助决策解决问题的功能。<sup>③</sup>概括来说,在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隐喻和类比发挥作用的阶段不同。隐喻的作用在于问题表征阶段,它帮助决策者框定情境、看待世界、表明问题,也可能提供一种有序的和期望的前景,但在决策阶段的作用有限。而类比主要在政策的形成阶段,它能对政策的最终决策起到更为直接、更明确的指导功能。

目前,隐喻对对外政策决策影响的研究不多,且主要是以美国对外政策为基础和依据的。尚未见到国内外学界把这个视角运用于对其他国家,包括对中国对外政策的研究。鉴于此,本文以擅长使用隐喻、语言风格活泼的毛泽东作为一个例子,探讨在毛泽东认识形势、框定外交议题过程中运用隐喻的特点,以及毛泽东对问题的表征方式在中国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不仅希望对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运用类比的特点进行一些抛砖引玉式的分析,也希望对前文提到的、政治心理学界关于隐喻的研究结论,提供一些基于中国外交实践的元素和思考。<sup>④</sup>

---

① Keith L. Shimko, “Foreign Policy Metaphor: Falling ‘Dominoes’ and Drug ‘Wars’,” in Neack et al., ed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p. 78.

② Keith L. Shimko, “Metaphors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pp. 655-671.

③ Ibid., pp. 654-666.

④ Keith L. Shimko, “Metaphor and Foreign Policy Making,”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pp. 655-671; Keith L. Shimko, “Foreign Policy Metaphor: Falling ‘Dominoes’ and Drug ‘Wars’,” in Laura Neack et al., e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pp. 71-84.

## 二、隐喻与毛泽东的认知特点

毛泽东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核心,也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研究毛泽东的个性、信仰,以及他对形势的判断和认识,是从个人层次理解新中国早期外交政策的重要途径之一。毛泽东不仅是一位革命家、外交战略家,也是一位语言大师。他在参加革命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独特语言风格和特色,是从语言学和心理学角度研究毛泽东外交的重要和非常可信的依据。在年轻时期,毛泽东就特别强调写文章要注意对象,言之有物。例如,他在《反对党八股》中强调,写文章、演说、讲话不能“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要注意对象,不要“对牛弹琴”。<sup>①</sup>他形象、生动、幽默又通俗的语言,贯穿其文章的始终。如他批评党八股的文风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是“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语言无味,“像个瘪三”。<sup>②</sup>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形容那些不了解实际,不调查研究的作风为“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批评那些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sup>③</sup>不管是在他的演说和文章中,还是在与其部下、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都经常引用一些历史典故和民间谚语、歇后语,大量形象地运用类比和比喻,风趣幽默、通俗易懂、寓意深刻。通过这些丰富的语言窗口,不仅可以洞察毛泽东认知思维方式,还可以研究毛泽东的对外政策思路和风格。

本文选取《文选》作为分析的文本,把《文选》中收录的自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1974年间毛泽东关于外交方面的文章、讲话、谈话、批示、电报共139篇作为分析材料和对象,重点探讨毛泽东使用隐喻的特点和可能对中国对外政策产生的影响。《文选》前期的文章大都是毛泽东根据形势的需要、针对特定问题而写,或者是在公开场合发表的演说,文风犀利、针对性强。后期的文章主要是毛泽东答记者问,或与外宾谈话的记录,多属于他的即兴谈话。前后文章有一致的文风,说明这些材料既非写作班子或秘书的手笔,也非政治局或中央会议讨论修改后通过的决议,因此是研究毛泽东心理和思想的最好的一手材料。本文对所使用隐喻的数量进行统计,通过文本分析,找出了《文选》中所使用的隐喻的源域和靶域,梳理其使用和分布状况,进而探寻毛泽东认知方式的一些特点。

需要说明的是,在选择分析对象的时候,本文区别了单个隐喻与系统隐喻。所谓单个隐喻是指在谈话或文章中仅用一个隐喻来说明或表达一个特定的意思,而未有更多的其他政策含义的隐喻。例如,毛泽东把美国在中国大陆的失败比作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777、793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90—794页。

③ 同上书,第754、758页。

“美国在大陆的赌博已经彻底输光”；<sup>①</sup>说1949年美国政府公布《美中关系白皮书》给那些还寄希望于美国的中国人“浇了一瓢冷水”等。<sup>②</sup>这些隐喻除了表达清楚一个意思外，无再次引用，其政策影响相对要弱，非本文分析的重点。而系统隐喻则是指一个反复使用，而且隐喻中暗含或包括有一系列其他的隐喻，而且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的隐喻。<sup>③</sup>从对外政策的影响来看，只有那些反复使用且具有政策含义的隐喻才能反映决策者的思维方式，对政策的结果产生影响。邝云峰在谈论类比作用时曾谈到，“和那些只使用一次的类比相比，被长期反复使用的一套类比，在政策形成过程和思考阶段不可能被用于证明根据其他理由做出的政策决定是合理的”，它们对政策形成肯定产生重要的影响。<sup>④</sup>同样，也只有那些不断被反复使用的隐喻才有可能反映决策者对形势表征，以及对政策结果产生的影响，才有政策含义。这些隐喻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毛泽东使用隐喻数量多，类型多样，涉及话题广泛、范围和领域都比较繁杂。这是毛泽东语言的一大特色。在《文选》所收录的139篇文章中，隐喻类型多达20多种，总计使用次数达180次，即平均每篇文章使用隐喻约1.29次。在这20种隐喻类型中，有9类隐喻出现在两篇及两篇以上的文献中，其中“走狗”和“纸老虎”这两个隐喻使用的数量最多，分别在27篇和9篇文章中使用过，出现的总次数分别高达66次和51次。此外，毛泽东还有12次谈到美帝国主义，以及蒋介石、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帝国主义、杜勒斯、台湾海峡时，把他们说成是“反面教员”，12次把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台湾和金门、马祖的占领，以及美国在其他国家的军事基地比成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6次用“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来说明不同性质的问题，6次把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说成是“鬼”，4次用“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说明美国虽然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管得太宽也就控制不住了，4次用“东风压倒西风”来比喻社会主义力量压倒帝国主义力量，其余的隐喻引用1—3次不等。可以看出，毛泽东所使用的隐喻比较多，也比较集中，这足以反映毛泽东的认知风格和特点。<sup>⑤</sup>

毛泽东使用隐喻的靶域表现了毛泽东的认知一致性的特点。在毛泽东所使用的20种隐喻的本体或靶域中有14类都明确涉及美国。这一事实说明美国，或对外交不仅是毛泽东外交政策考量中的重中之重，而且美国也是毛泽东最偏好用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页，第103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27页。

③ Shimko, “Metaphors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p. 663.

④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p. 16.

⑤ 有关毛泽东使用隐喻的统计见潘丽君《毛泽东的认知和外交政策：从比喻和类比的视角》，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硕士毕业论文，2010年6月，第15—21页。

隐喻去理解和分析的对象。毛泽东针对或涉及美国(及其支持的反动势力)所使用的隐喻主要是“走狗”、“鬼”、“野兽”、“纸老虎”、“反面教员”、“强盗、江洋大盗”、“晚上六点钟的太阳”、相信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信誉的“破产”等。这些隐喻在中国文化中都具有极其强烈贬义色彩。虽然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对外关系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毛泽东并没有多少隐喻来形容或代指苏联。如果将毛泽东指代美国的隐喻和少数指代苏联的隐喻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美苏黑白分明的认知特点。如以美国为首的反动派和以苏联为首的革命力量,“野兽”或“老虎”(美国)与“武松”(人民;“帝国主义”与“民主国家”,“西风”(美帝国主义)与“东风”(社会主义);“下午六点钟的太阳”(美帝国主义)与“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总要破产”,“社会主义的前途总是光明的”等等。这些隐喻所体现的毛泽东对美国的一致性认识与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苏联的敌人意象具有类似的特点和高度的一致。<sup>①</sup>通过两者对比,可以从个人层次解释冷战初期东西方对抗的心理根源。

在毛泽东所引用的各种隐喻中,有不同源域与同一靶域进行比较的情况,也有用同一源域去理解不同靶域的情况。毛泽东所用隐喻的靶域反映了毛泽东认知过程的另一显著特点,即认知陈规或定式,或认知类别。凡是在毛泽东视野中被认为是反动的、落后的势力,不管中外、古今,也不管他们是否互相认同或喜欢,毛泽东统统都把他们归为一类。如毛泽东使用最多的隐喻“纸老虎”所指代的对象,就包括美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希特勒、墨索里尼、俄国沙皇、中国皇帝、日本帝国主义、原子弹,甚至还有后来变修了的苏联。另一个他使用最多隐喻的喻源是走狗。毛泽东把那些凡是跟随美国,或站在美国一边的人或势力都统统比作“走狗”,包括美国支持的中国反动派、各国反动派、国民党反动派、李承晚、反动势力、亚非拉反动势力、蒋介石和吴庭艳等。比喻这些势力的同样喻源还有“教员和反面教员”等。总之,只要在毛泽东眼中是坏人,都是一类货色,没有什么区别,见其一即可知其全体。

当然,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也经常使用同样的隐喻,来比较不同的对象,说明不同的内容和性质的问题。如他曾用“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来理解“少数压迫者与多数好人、被压迫者的关系”,<sup>②</sup>又用来解释中苏之间存在的“少数分歧和多数共同点”,<sup>③</sup>还用来指代中国所能制造的“少量核武器”与美国拥

① 霍尔蒂(Ole R. Holsti)通过内容分析方法对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谈到苏联时的用词进行归类分析,揭示杜勒斯对苏联怀有一种敌人的意像(image of enemy)。在杜勒斯的眼中,苏联永远是一个虚弱的、充满敌意的、最终要失败的国家。见Ole R. Holsti, "The Belief System and National Images: A Case Study," in James 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pp. 543-550.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19页,第399—400页。

③ 同上书,第322页。

有的“大量核武器”<sup>①</sup>乃至中印之间的分歧和共同点等。从认知角度来看,更有意义的问题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把苏联比作“和平堡垒”,到了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也成为毛泽东眼里的一个“纸老虎”。是中苏关系的恶化导致了毛泽东对苏联看法和认识的变化,还是毛泽东对苏联认知的变化是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这个类似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完全由研究者所确定的变量关系来决定。

### 三、隐喻思维与毛泽东的对外政策

从认知角度对隐喻研究的结论是,隐喻的作用主要在于帮助决策者诊断形势、框定问题。分析《毛泽东外交文选》中使用最多的两个隐喻——“纸老虎”和“走狗”为这一结论提供了佐证。但是,考察和分析毛泽东使用的其他具有重要政策含义的隐喻的结论则是,隐喻不仅在决策的第一阶段具有问题表征的作用,而且在政策制定过程的第二阶段具有类似与历史类比的问题解决功能。此外,对毛泽东使用的隐喻的政策宣示和公共政策作用进行分析,本文发现由于隐喻的跨文化差异,隐喻在对外政策上所造成的误导作用也是不能小视的。

#### (一) 关于隐喻的问题表征和框定形势的认知功能

“纸老虎”这一词语本属民间俚语。至少从元末明初就流传于市井之间,距今已经有700年的历史。清末民初,“纸老虎”已成为民间流行词语。<sup>②</sup>到19世纪中,英国来华传教士马礼逊编著的《广东土话字汇》中记录有paper tiger一词。<sup>③</sup>毛泽东借“纸老虎”的外强中干的意思,来喻指那些外表强大,实则内里空虚的势力。这个词因毛泽东反复使用而享誉国内外。在本文截取的年限期间,毛泽东至少在9个场合使用“纸老虎”这一词语,其中1958年12月1日,毛泽东在武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发表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讲话,更是集中探讨了它的“纸老虎”理论。<sup>④</sup>

毛泽东将他不喜欢而又强大的力量说成纸老虎,是通过历史的类比得出的。

① 同上书,第476页。

② 《水浒传》第二十五回,在“王婆计啜西门庆,淫妇药鸩武大郎”里,西门庆与潘金莲被武大捉奸,西门庆害怕躲在床下,潘金莲说“见个纸虎,也吓一跤”,说武大只是一个纸老虎。西门庆听后说,“不是我没有本事,一时间没有智量”,遂从床下爬出来,打伤武大,夺路而逃。参见施耐庵《水浒传》,哈尔滨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页。

③ 马礼逊编著《广东土话字汇》,转引自黄河清《“纸老虎”的来历》,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3年1月。

④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62—363页。

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他接着列举和援引了多个历史的类比,如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前的沙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军国主义,中国的蒋介石和支持他的美国反动派等,虽然一时都非常强大,但最后都还是失败了。这些历史的先例都说明反动势力是外部强大、吓人的,但本质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都是纸老虎。<sup>①</sup>考虑到“纸老虎”的比喻义,毛泽东用此词指当时中国面对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显然具有明显的鼓舞士气的政策宣示和公共政策含义。

如果从认知的角度去理解,“纸老虎”这个隐喻反映了毛泽东完整的认知逻辑。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对这个逻辑有详细的阐述。他说“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sup>②</sup>毛泽东的逻辑是:帝国主义有着对别国干涉和侵略的本质和强大的力量,是名副其实的真老虎,能吃人的。但从历史经验出发,毛泽东得出了其必定走向失败的,促进其从“真老虎、铁老虎、活老虎”向“纸老虎”的转变。“纸老虎”的比喻透露出毛泽东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把握,这种认知逻辑的政策影响是,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内力量十分弱小,不是美国的手,但在对美政策上却仍然具有在多方面跟美国叫板的战略勇气,这种认识逻辑解释了新中国既防范,又对抗,以对抗为主的充满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对美政策。毛泽东对原子弹的看法和逻辑与毛泽东对美国的看法有类似之处。一方面,毛泽东从战略的眼光出发,认为原子弹和大刀长矛没有什么两样;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深知其威力和破坏力的巨大,因此高度重视对原子弹这种武器的研发,想方设法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自己的原子弹。

“走狗”一词英文译文为 lackey,或 running dog,本指猎狗,是帮助猎人打猎、看家的助手,是人的忠实朋友。在汉语中这个词却有着明显不同的含义,它隐喻受人豢养而帮助作恶的人、谄媚的人或阿谀奉承的人。<sup>③</sup>在一般中国人的视野中,被比作走狗的人往往有这些特点:整天夹着尾巴做人,以讨得主人欢心为目的,如果主人需要,就仗势欺人,伤害别人。一旦主人高兴,自己就会得到好处,但是如果主人不高兴,就得不到好处,甚至受到惩罚。毛泽东把美帝国主义当作全世界人民的最大敌人,因此凡是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包括国民党反动派、李承晚集团、吴庭艳集团,以及任何其他国家的反动势力都被看作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些国家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63页。

② 同上。

③ 《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43页。

一方面得到美帝国主义的支持(豢养),另一方面是美国的盟友、助手,帮助美帝国主义作恶。这样的隐喻说明了毛泽东对反动势力的蔑视和憎恨。此外,走狗这个隐喻还告诉人们,痛打走狗也是对主人的一种教训,因为中国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特别是在对这些“走狗”的主人美帝国主义不能有所作为,或无能为力的时候,通过打击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走狗,各国反动派,特别是蒋介石集团,也是对中国最主要的敌人美国的打击。正如在1958年的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过程中,为了惩罚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毛泽东决定炮轰金门,但是在美国插手,派出军队为蒋舰护航的时候,毛泽东命令前线,“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即使在美舰首先开火的时候,也要要求前线奉行“没有命令不得还击”的政策。<sup>①</sup>

正如目前关于隐喻作用的研究所指出的,隐喻除了说明形势即问题表征外,对政策制定的意义并不直接。“纸老虎”这个隐喻并没有指导毛泽东应该使用怎样的具体策略来对待美帝国主义,没有提示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手段,如何与美国对抗,采取什么策略去试试“美帝国主义”到底是纸老虎、真老虎,还是铁老虎。中美在朝鲜战争较量以后,双方都小心谨慎,并没有再发生大的武装冲突。对于另一个被看作是纸老虎的原子弹,毛泽东也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随便使用原子弹,而是始终采取一种被动的防御姿态,从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中国就承诺不首先使用,也不对无核国家使用原子弹。对《文选》中毛泽东使用的主要隐喻对中国对外政策影响的分析,支撑了国外对隐喻作用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 (二) 关于隐喻确定政策、解决问题的认知功能

毛泽东所使用的隐喻并不局限于对形势的认知和对问题的框定。毛泽东在提出政策的时候也习惯使用一些隐喻。本文以形容新中国成立初期执行的三大政策——“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个隐喻为例,探讨隐喻超出问题表征功能的作用。在这三个政策中,除了“一边倒”包含在《文选》外,其他两个隐喻虽没有收录在《文选》中,但据信均为毛泽东所首次提出,它们对新中国早期对外政策的形成发挥了超出问题表征的作用。

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和有关的研究表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个隐喻,是毛泽东在1949年2月与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谈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政策时提出来的。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他的屋子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地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到门窗缝里,把那

<sup>①</sup> 叶飞《毛泽东指挥炮击金门》,《人民日报》1993年12月24日,第五版;曲星《中国外交5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202页。

些脏东西打扫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sup>①</sup>毛泽东用一个非常口语化的隐喻,非常形象地说明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所面临的国内形势。更重要的是,他说明了根据这种形势,新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或者说,指出了新政权该怎么办的问题。这个隐喻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被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根据这一政策,新中国成立后按照轻重缓急,根据国籍 and 行业,考虑到对方对新中国的态度,逐步和有序地废除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将屋子“打扫干净”。<sup>②</sup>后来周恩来概括说,“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关系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sup>③</sup>当然,这个隐喻还有更深层次的意思,那就是在屋子打扫干净后,还要请客,即新中国在站稳脚跟后还要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开展对外贸易,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往来等。只是由于形势的变化,这个政策的后续没有得到落实。这个政策的制定和形成,经历了从毛泽东在谈话中以隐喻表明意思,到形成完善的政策,到这个政策逐步被落实,再到新中国首任外长周恩来系统概括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由毛泽东的一个隐喻开始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另一政策“另起炉灶”,也是由毛泽东在1949年春用一个隐喻提出来的。这个习惯用语本指把原来的灶台拆掉,重新建一个新的灶台。《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其意为,(1)比喻重新做起;(2)比喻另立门户或另搞一套。”<sup>④</sup>毛泽东在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方针时,以隐喻的方式提出来的,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其具体政策内容后来也被逐步丰富、充实和完善:在1949年9月30日召开的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予以确认;1952年周恩来外长对这个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解释和说明。周恩来指出,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sup>⑤</sup>这个隐喻的核心是,对外不继承国民党政府与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把旧的传统、习惯、联系截割;对内就是“决不能依靠旧外交部的一套人马办外交”,必须“创建新的外交

①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西柏坡与新中国》课题组:《西柏坡与新中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页。

② 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1949—1909》,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9页。

③ 周恩来《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④ 《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32页。

⑤ 周恩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8页。

队伍”。<sup>①</sup>保证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落实,割断了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

“一边倒”政策也是一个隐喻,其政策意义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另起炉灶”具有同样的作用。这个政策是毛泽东通过对苏联革命、中国革命(包括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走中间道路的南斯拉夫的遭遇三个历史经验的总结,或者是经过三个类比得出的。<sup>②</sup>《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其更具体的内容:新中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根据这个政策,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访问了苏联,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具体实践了这个政策。

从认知的角度考虑,毛泽东所使用的隐喻可以划分为两类。具有问题表征作用的引用隐喻和具有解决问题、指出具体政策内容的隐喻。前者如毛泽东把美国和原子弹喻为“纸老虎”,把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势力喻指为“走狗”;后者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大政策。在三大政策中,“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具有特殊性,它不仅说明了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判断,即“屋子”太脏,但更多的是指导将来的政策,首先要把“屋子”打扫干净,以便准备将来“请客”。另外的两个隐喻“一边倒”和“另起炉灶”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指导将来的政策。

### (三) 关于隐喻宣传政策的公共政策功能

到目前为止,在政治学界对隐喻作用的研究多从认知的视角进行。但不应该忽视的是,隐喻作为语言手段所具有的宣示和说明政策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与前文所分析的隐喻的认知和分析功能并不矛盾。正如邝云峰在谈到历史类比作用时所说,“在公开场合用于证明政策合理性的(类比),在私下通常是用于分析。”<sup>③</sup>这对隐喻的作用也是完全适用的。

本文在此主要想探讨隐喻在政策宣示方面的作用。毛泽东熟悉中国文化和历史,擅长从古文中择取比喻,不管是用来表征问题,认识形势,还是表明政策内容,指导对外政策实践,对中国人来说,已经习以为常,认为这样的语言表达方式,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表现了隐喻在说明问题、宣传政策、鼓舞士气的公共政策作用。但

<sup>①</sup> 甘布师《周恩来与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建设》,载《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302—303页。

<sup>②</sup> 张清敏、潘丽君《类比、认知与毛泽东的对外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54—72页。

<sup>③</sup>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p. 260.

是,毛泽东并非只是在与中国公众的沟通中运用这些隐喻的,而大部分是在与外宾谈话,或者在国际场合讲话中使用这些隐喻的。由于毛泽东在国际场合运用这些隐喻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受众群体的文化差异,结果使不少基于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的隐喻不仅没有起到解释和宣示政策的公共关系的作用,却因为其他国家领导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和不熟悉,往往产生误解,进一步加大了中国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之间的隔阂,恶化了中国与它们的关系。

毛泽东关于纸老虎的比喻是一个例子。有研究表明,1946年8月,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到延安在采访毛主席期间,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当时担任翻译的余光生先生使用了一个英文惯用词——Scare-crow(稻草人)作为其英文译文。毛泽东当时就纠正了他,说不行,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纸糊的老虎,是Paper-tiger。<sup>①</sup>在冷战时期,毛泽东非常自信和习惯地用这个词表达他自己的思想和看法,不需要考虑他所指的对象是否能够接受,因为处于对抗时期的中美之间没有交流和沟通的机会。但在与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这种文化隔阂就表现的非常明显了,其消极影响也就表现出来了。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1949年底,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时虽然目的很清楚,但对斯大林提出的“到苏联来有什么具体的目标”的问题,他考虑到苏联有经验,又是主人,应该主动提出,于是就以隐晦的语言回答说,他想要一些“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一时让斯大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翻译不得不进一步解释说,即这个东西不仅要有好的形式,也要有好的内容。<sup>②</sup>1954年,印度领导人尼赫鲁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毛泽东就用自己独有的方式与尼赫鲁交流他对原子弹的看法,他强调原子弹和大刀长矛没有什么区别,双方最终没有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sup>③</sup>这是否影响了此后的中印关系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随着毛泽东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交往,向更多的人提出他关于原子弹的这种看法,也就导致了更多人的不理解。例如,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以“极而言之”的风格讲了他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逻辑后,引起了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的误解和担心。从中国人的视角看,受到老庄思想影响的毛泽东是用辩证的思路看待这个问题的。但是在赫鲁晓夫等人看来,原子弹可不是什么“纸老虎”,不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原子弹打起来,整个世界也许都要毁灭掉,哪里还有人民可靠?<sup>④</sup>针对毛泽东所说的打起仗来,世界人口死了一半的说法,捷克领导诺沃提尼曾愤愤

① 《毛泽东遗物的故事》,《长沙晚报》2010年3月26日。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45页。

③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70—171页。

④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7页。

不平地说:毛泽东说他的6亿人口准备损失掉3亿。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打起仗来都得死光,谁还能开张?<sup>①</sup>如果原子弹是“纸老虎”的隐喻并没有直接导致中国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恶化,至少也在双方之间产生了误解,造成了极大的不快。

此外,毛泽东使用的其他隐喻也有因为文化差异导致被误解,从而影响中外关系的情况。例如,毛泽东在1957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上借用中国的成语,“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的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性的优势”。<sup>②</sup>这种说法在处于不同地理位置,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苏联和东欧国家领导人听起来,却明显变了味。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日益壮大的中国在他们的东面。赫鲁晓夫后来也曾经说过,不论毛泽东本意如何,说什么东风压倒西风,从俄国人的习惯上讲,也是不好的一种形容。对俄国的地理环境来说,这个成语恰好反了,因为只有西风才能够带来雨水,东风带来的只是干燥的空气,对农作物不利。说东风压倒西风,难免让人想起来成吉思汗所带来的“黄祸”。<sup>③</sup>

同样,让其他国家领导人对毛泽东不满的,是毛泽东使用的另一个隐喻,“蛇无首而不行”。毛泽东本来想以此比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苏联党的关系,意思是说凡是集体,总要有个带头的。但是,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人认为蛇是不吉利的象征,他们对把共产主义运动比喻成蛇,也不以为然。<sup>④</sup>这一点也解释了国际政治心理学的一个发展趋势,即借助隐喻或类比等语言工具对领导人的认知过程进行研究的时候,应当将社会文化因素对政治人物心理、个性和认知的影响纳入其中。<sup>⑤</sup>因为任何对“个性的分析必须与历史事件是如何塑造领导人和领导小组的,以及记忆和他们特别政治社会的文化影响结合起来”。<sup>⑥</sup>

当然,语言表达方式绝非中国与苏东,或者中印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本文借用语言学和心理学的分析视角,通过对《毛泽东外交文选》的语言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之一是,不管是引用隐喻框定形势,表征问题,还是在提出政策,指导行动,

① (俄)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94—395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91页。

③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16页。

④ 同上书,第417页。

⑤ Vertzberger, *The World in Their Minds*, Chapter 4, *The Social Milieu: Small Group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s*; chapter 5, *The Societal-Cultural Prism*. Ofer F. eldman and Linda O. Valenty eds., *Profiling Political Leaders: Cross-Cultural Studies of Personality and Behavior*, Westport, CN: Praeger, 2001.

⑥ Alexander George, “Preface,” in Jerold M. Post, *Leaders and Their Followers in a Dangerous World: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Behavior*,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x.

抑或是在宣传和说明政策方面,对隐喻的运用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手段和工具,但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等差异也往往产生误导,这也是隐喻被称为“危险的陷阱”的原因之一。

## 四、结 论

本文不属于对毛泽东个性的研究,也没有试图对毛泽东的心理进行分析,而只是借用毛泽东所运用的语言,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对隐喻的作用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探讨。毛泽东对苏联和美国认知的变化是决定和影响中国对外政策,导致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因素。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探讨这一变化的心理机制和认知逻辑,是具有更重要学术意义的议题,需要借用态度变化(attitude change)的理论进行更深层次分析。本文对毛泽东使用的隐喻的有限分析,对隐喻在对外政策中作用,可以得出两个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从政治心理学或认知的角度看,隐喻的作用取决于决策者运用隐喻的目的和意图:如果决策者引用隐喻是为了说明特定的形势和问题,那么所用隐喻就具有框定问题、表征问题的作用。如果决策者引用隐喻旨在说明政策,那么隐喻的作用就属于历史类比的第二部分了,即帮助决策者提出和形成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框架。隐喻的这后半部分作用被忽视的现象并不局限于中国。即使在对隐喻作用进行广泛研究的象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者在决策的不同阶段都有引用隐喻的习惯,而不仅仅是在判断形势阶段。例如,1980年,美国政府派特种部队到伊朗营救美国人质的“鹰爪行动”(Operation Eagle Claw),1991年对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沙漠风暴”(Operation Desert Storm/Shield),以及2003年推翻了伊拉克政权,并最终把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送上了断头台的“斩首行动”(Decapitation Strike)等。这些政策都是借用隐喻的形式,生动形象地说明了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方式、规模等。只是到目前为止,有限的研究仅仅关注了那些用于说明形势的隐喻,而没有将此这后一类的隐喻纳入他们的研究视野和范畴,对其作用进行分析。

第二,从交际或交流学的角度看,本文关于隐喻的政策宣示功能的结论,支撑了将社会文化背景纳入政治心理学研究之中的发展趋势。早期的政治心理学研究很少将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对个人的影响考虑在内,而只关注对特定的政治人物的心理分析或个性研究。他们的解释是,“如果相似文化背景中的个人相互之间都会发生错误知觉,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必然会出现类似的错误,且其程度只能更

加严重。”<sup>①</sup>到目前为止,关于隐喻作用的研究也没有将社会和文化因素考虑在内。与历史类比,特别是与为世界各国都熟悉的历史类比有所不同的是,隐喻中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带有鲜明的民族和地方特色。要传达和理解隐喻的内涵,需要处理好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包括跨文化交流,乃至语言的翻译问题。既要保留原语中隐喻的文化习俗,还要表达出隐喻包含的民族和地方特色,这样才能保证隐喻交流传播的有效性,最佳地传递信息,实现隐喻的公共政策功能。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隐喻无处不在,既是语言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它“不仅仅存在于语言中,而是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中。我们日常赖以思考和行动的概念系统本质上说是比喻性的。”<sup>②</sup>正如马克斯·布莱克(Max Black)所说,“也许每一种科学都必须以隐喻开始,以代数结束;也许没有隐喻就永远不可能有代数。”<sup>③</sup>借助我们表达思想的语言工具去了解我们的思维,研究我们的政策,也许是一条值得探索却没有很好开垦的路子。

---

① 秦亚青“译者前言”,载(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② Lakoff and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p. 3.

③ Max Black, *Models and Metaphor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242, quote from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Summer 1988, p. 435.

a hot topic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China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is area.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its participation in health diplomac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with each period marked with notable characteristics. The 2003 "SARS Incident" wa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Though health diplomacy belongs to "low politics," it has affected and continues to affect China significantly in many aspects. As a great developing country and with a population of 1.3 billion, China faces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it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health diplomacy, and various sources of knowledge are needed to cope with such challenges.

Returning to Asia: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Indochina Policy ..... *Niu Jun* (62)

There is a controversy with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bout whether or not China had a regional strategy or policy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late 20th century. During the decade of normalization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from 1979 to 1989, China's Indochina policy in the strategic ga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gradually shifted from its old pattern on the anti-Soviet united front and eventually returned to the category of East Asian regional policy. Beginning from the mid-1980s, China gradually shaped its East Asian regional policy.

Metaphors, Problem Representation, and Mao Zedong's Foreign Policy ..... *Zhang Qingmin* (81)

Problem representation refers to how a certain situation and problem is understood and presented. A metaphor is both a cognitive tool and a method of problem representation, which affects both cognitive processes and policy outcomes. Through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 in *Mao on Diplomacy*, characteristics of Mao Zedong's use of metaphors in his cognitive processes can be understood. Mao's cognitive process is characterized as consistent and strictly framed in a set pattern. His use of metaphors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s of policy making affected his way of problem representation and situations framing. In the stage of establishing policy it functioned as guideline for action or problem solving. In the later stages of policy making, it had a function of explaining the publicity of policy. The negative impact of using metaphors implies that when studying cognitive processes, social and culture factors should be integrated.

The Middle Way and Power: China's Traditional Wisdom and Strauss' Ancient Rationalism ..... *Tang Shiqi* (101)

This paper compares Leo Strauss'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Western rational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wisdom in three aspects: the hierarchy of human souls and its political relevance, esotericism, and the relation be-